

陆方
李之渤著

晚清淮系集团研究

——淮军、淮将和李鸿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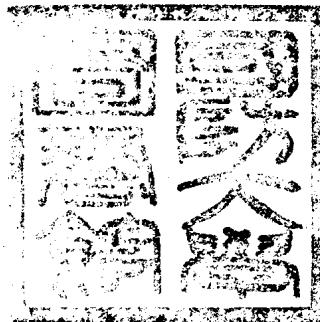
国防大学 2 061 1630 8

122

晚清淮系集团研究

——淮军、淮将和李鸿章

陆 方 著
李之渤

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12号

晚清淮系集团研究

WANQING HUAIXI JITUAN YANJIU

陆方 李之渤 著

责任编辑：包瑞峰 封面设计：李冰彬 责任校对：黄殿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10号)

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制版

(邮政编码：130024)

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1993年7月第1版

印张：12.25

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70千

印数：1—1 000册

ISBN 7-5602-0902-5
K·69

(精装)12.00元
定价：(平装)3.00元

前　　言

淮军是淮系集团形成的基础，淮将是淮系集团的主干，李鸿章是淮系集团的总头目。淮系集团是晚清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。

晚清淮系集团形成于淮军镇压太平天国、捻军起义时期，没落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，它曾经一度左右着清王朝的军事、政治、外交，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的政局。

晚清淮系集团对非本集团的军事政治集团有排他性；而本集团内部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、对世界发展形势的认识，以及本人经历各异，又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，在对外民族战争中也有不同的表现，所以，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。研究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情。

史学界对晚清淮系集团的研究，刚刚起步。这一部稿子，是我们从多年来研究成果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文稿，略加整理，奉献给读者！

书中粗疏拙陋之处，希望获得同志们的批评指正。

有一点需要说明的，书中有几篇稿，是我们的研究生所作、我们加以指导修改而成的，它们是：《淮军勋字营统领、湖南提督杨鼎勋》——张格林；《仁字营统领、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》——张格林；《开字营统领、南赣镇总兵程学启》——刘振军；《武毅铭军统领、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》——刘世华；《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》——高翠莲；《李鸿章与〈中俄密约〉》——王景泽。

另外,《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》一文是陆方与宋德玲同志合作写成的。

作 者

1992年3月

目 录

淮军建立初探

李鸿章 —— 中国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先驱	(282)
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与李鸿章	(296)
中法战争中的李鸿章	(309)
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	(320)
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	(333)
李鸿章与《中俄密约》	(348)
庚辛之际的李鸿章	(360)

淮军建立初探

——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

近日我们在《安徽史学》淮军研究专栏读了董蔡时同志写的《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》一文，受益匪浅，但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讨论。这里把这些问题提出来，并说明我们的看法，不当之处，请蔡时同志批评指正。

蔡时同志在《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》一文中写道：

1861年“十一月下旬，曾国藩与李鸿章商决，命李鸿章回淮南招募淮勇，筹组淮军，并与李鸿章约定：‘以来年二月（3月）济师’”。

“一八六二年一月初，李鸿章从安庆回淮南，仅仅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便招集了周盛波、周盛传兄弟，潘鼎新、刘铭传等部团练，‘编为四营’，向安庆集中，联系好而因故未能及时集中的，尚有吴长庆、张树声兄弟等部团练。其后，李鸿章到沪上不久，也都率勇来会。”

我们认为，这两段文字有两点值得商榷。

第一，“一月初，李鸿章从安庆回淮南，仅仅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”，便招集了淮军若干营。这种看法似可商榷。1862年1月初（即旧历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），至2月22日

(即咸丰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)李鸿章移居安庆城外淮军营盘之日，据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载曾逐日与李鸿章接触情况，或久谈，或鬯谈，或久坐等等，无李鸿章去淮南募勇迹象。安庆距离合肥约300里，就当时交通工具情况，往返一次总得5—7日，还得办事呢！此期间曾国藩与李鸿章3日不见面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过，怎么能外出一个多月呢？所以，我们认为蔡时同志此种看法值得考虑。蔡时同志这种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窦宗一编的《李鸿章年(日)谱》中有两段文字：“1862年1月4日(旧历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)鸿章与曾国藩连日会商援苏浙军事，并与彭玉麟晤会后赴合肥募勇。”^①另一段“2月4日(旧历正月初六)合肥团练周盛传等以义愤所激与太平军陈玉成、陈得才等部下相持十年，互战二百九十六次，两方死伤近万，未向清廷请一饷，受一职。鸿章奉曾国藩命成立淮军乃来合肥，联络周盛传兄弟、刘铭传、张树声、吴长庆等编为四营，向安庆集中。”^②注意蔡时同志“编为四营”的引号，以及我们所加的小圆圈，来龙去脉一目了然。一般地说，“因人成说”是可以的，值得考虑的是所因的“成说”是否可靠。前引窦书的第一段，原书作者注明材料出自《曾文正公年谱》卷八页五及《周武壮公遗书》。我们翻查了《曾文正公年谱》卷八页五，并未发现李鸿章去合肥的记载，在《周武壮公遗书》的《年谱》中发现如下记载：“值今爵相少荃李公鸿章募淮军于安庆，招予兄弟往，予兄弟之许国爰自此始。”^③值得注意的是周盛传用了一个

① 窦宗一：《李鸿章年(日)谱》，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69年1月版，第4799页。

② 同前书，第4800页。

③ 周盛传撰：《周武壮公遗书》(清光绪三十一年刊)，《年谱》卷首，页十四。

“招”字，并未说明李鸿章至合肥，与窦书不一致。前引窦书第二段，原书作者注明材料出自《曾文正公年谱》卷八页四及日记，我们反复查阅，也未发现李鸿章去合肥募勇的记载。所以，蔡时同志认为李鸿章去合肥一个多月招得淮军是站不住脚的。

那么淮军是怎么招募起来的呢？李鸿章主要通过书信来往，与合肥、庐江等地团练头子张树声、潘鼎新筹商招募淮军，而张树声替他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才完成招募的。这并不是奇闻，有资料为证。《张靖达公神道碑》写道：

“自咸丰初遭洪杨之乱，豪杰并起，召徒党勒军阵，与死贼抗拒六、七年，及相国李公治军上海，诸公各提闾里子弟为军，森起景从。……始诸公初起闾里，皆散处四野，公独以谓寇来无方，不得地利不足自葆，就于是创结堡寨，阻山河为险，尝据堡击郤悍贼陈玉成，由是诸公先后仿依为堡，百数十里间连屯相望，贼豕突狼顾，不得便利，淮甸以不大柔。……公既倡为堡寨及后李公从曾文正公军江西，又遣间使走江西军，贻书李公论贼形势利钝，及乡勇可倚办贼状，甚具。曾公见其书，大奇之，诧曰：‘独立江北，今祖生也。’由是公名始显闻，同治元年以军从李公。”^①

这段材料说明张树声在合肥地区地主团练中居首领地位，以及他与李鸿章的关系。

张之洞等人会奏《积劳病故胪陈事绩折》中写道：

“咸丰初年粤逆方张，皖北盗贼蜂起，树声率其弟已故广西右江镇总兵树栅团练乡兵，筑土堡拒贼，远近豪俊，奉约束惟谨，大股悍贼来扰屡挫其锋。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，

^① 吴汝纶：《桐城吴先生全集》（民国年刊），《文集》卷二，页十二。

前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波，湖南提督周盛传，皆树声所与联团御侮者。同治元年今大学士直隶督臣李鸿章督师赴上海，令树声募勇从，树声为言刘铭传及周氏弟兄才武，左提右挈，各建旗鼓，淮军之兴，实树声为之倡也。”^①

这段材料反映李鸿章与张树声谋建立淮军，以及张树声在建立淮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

咸丰十一年冬月十一日（1861年12月12日）李《致潘鼎新》：

“帅（指曾国藩）意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，募练五百人，其口粮与张山樵之淮勇一律……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。如愿习此间队伍纪律，及扎营神速，请赐回示，再行专札调赴皖城，勤加训练。楚军招募，准领枪炮器械帐棚，起程时支小口粮，勇夫每日给钱百文，到营点名后给大口粮。前寄上营制刊本，可覆按照请也。”^②

此信是李鸿章为招募淮军而写给潘鼎新的，从此信可见此前李已写信给潘，潘鼎新也写过信给李鸿章。

按湘军招募办法是由大帅选拔统领，统领选拔营官，营官选拔哨官，哨官选拔队长，队长招募勇丁。李鸿章初建淮军，本身不过是一个统领，所以他只要选拔好营官，就算完成了。而做到这一点用书信与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周盛传等联系，是可以办到的，无须他到合肥坐镇一个多月。须知张、潘、周手中均有现成的团练队伍，就更无须李鸿章亲自动手了。

第二点值得与蔡时同志商榷的是淮军初建哪“四营”问题。蔡时同志文中谈到李鸿章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“便招集

① 何嗣焜编：《张靖达公奏议》（清光绪二十五年刊）卷首。

② 年子敏编：《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》（中华书局，1933年版）页一。

了周盛波、周盛传兄弟，潘鼎新、刘铭传等部团练，‘编为四营，向安庆集中，联系好而因故未能及时集中的，尚有吴长庆、张树声兄弟等部团练。其后，李鸿章到沪上不久，也都率勇来会。’而窦书写道：‘李鸿章奉曾国藩命成立淮军乃来合肥，联络周盛波兄弟、刘铭传、张树声、吴长庆等编为四营，向安庆集中。’二者对比，蔡时同志把吴长庆、张树声兄弟排除在‘四营’之外，这恰恰是错误的。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窦宗一《李鸿章年（日）谱》记载正确，它同样是错误的。那么李鸿章初建淮军‘四营’是哪四营呢？据《续修庐州府志》记载：

‘曾国藩募练皖北之勇，名曰淮军，以同知张树声、潘鼎新，守备吴长庆，千总刘铭传分领之，立为树、鼎、庆、铭等营。明年归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统带赴上海征剿。’^①

可见初建淮军四营是树、鼎、庆、铭四营，即非窦书所说“四营”，也非蔡时同志所谓“四营”。

另据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，未见周氏兄弟带队来安庆集中，却见张树声兄弟、吴长庆带树字营、庆字营至。

至于蔡时同志所说的吴长庆、张树声因故未至安庆集中，后来率部至上海来会，恐怕是起于误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吴长庆、张树声带所部至上海后，当年秋天李鸿章感到兵力不足，派吴长庆、张树声等回籍募勇，^②于次年夏返回上海。蔡时同志未认真考察淮军各营集中安庆，并从安庆赴上海的情况，所以弄错了。至于周氏兄弟未至安庆集中怎么

^① 汪宗沂等：《续修庐州府志》（清光绪十一年修）卷二十二，页二十四。

^② 吴汝纶编：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（清光绪戊申金陵刊），《朋僚函稿》卷一，页四十、四十五。

到上海的呢？《周武壮公遗书》·《年谱》中写道：同治元年“四月（公历5月）爵相署苏抚统兵赴沪，予与四兄（盛波）并奉檄充抚标亲兵营哨官。”^①这说明周氏兄弟至上海是在李鸿章奉令署江苏巡抚之后，到上海后他们兄弟二人统抚标亲兵营，一人任营官，一人任哨官，并非统盛字营。

二

蔡时同志在《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5月2日，李鸿章统率的淮军（包括湘军）全部到达上海，共计五千五百人，其中淮勇三千五百人，湘军二千名”。蔡时同志还在注中进一步做了说明和“考证”，“关于李鸿章从安庆率领兵勇抵沪人数，各家记载不一。郭廷以《太平天国史事日志》作六千五百人，冯桂芬《显志堂稿》作万人，李书春《李文忠公年谱》作八千人，窦宗一《李鸿章年(日)谱》作五千五百人。考《李文忠公全书·朋僚函稿》卷一中《致曾国藩(十二)丈》函中有：‘敝部现集湘勇二千，亲兵一千，新者五百，林字新勇一千，淮勇三千五百，春字老勇五百，开字一千，承沅丈允借，感甚。新募四营尚可，’可见李鸿章初抵沪全部兵勇五千五百人，唯其中程学启的开字营二营一千名，亦算作淮勇。”

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。

第一，5月2日李鸿章统率的淮军（包括湘军）全部到达上海了吗？

^① 周盛传：《周武壮公遗书》（清光绪三十一年刊）《年谱》卷首，页十四。

4月13日（即旧历年三月十五日）李鸿章《上曾相》中写道：

“淮勇二帮日内当到，会防局绅业与洋人议明留后帮船以载熊（陈飞熊部）、垣（马先槐部）二营，该营到皖求即札知，以便饬局放船来接。”^①

这是李鸿章到上海后第五天，写给曾国藩的第一封信，仍在考虑后至的营头运输问题，能说完结了吗？说当时还不到5月2日！那么5月2日到齐的勇数中你包括了熊垣二营了吗？

另据四月十八日（公历5月16日）李鸿章给清廷所上第一份奏折中说：

“臣于三月初八日（即公历6月4日）带勇二千人搭船由皖启行，初十日（即公历4月8日）抵沪，续到兵勇四月初四日（即公历5月2日）止，共五千五百人，俱扎上海城南，现尚有楚勇二营未至，总兵黄翼升所带淮扬水师四千余人协剿东西梁山一带，尚无下驶准期……”^②

可见5月2日淮军并未全部到达上海，尚有陆师二营和四千余人水师未至。

第二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淮军至沪人数问题。蔡时同志经过一番“考证”，表示赞成窦宗一《李鸿章年（日）谱》一书的看法，既不同意郭廷以的六千五百人，也不同意当时人冯桂芬的万人说法，其实窦说是错误的。这一点前边两条材料已经证实了，我们再依据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将全部情况披露如下：

“三月初七（公历4月5日）出城至洋船看亲兵营韩正国

① 吴汝纶编：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（清光绪戊申金陵刊）《朋僚函稿》卷一，页十一。

② 同前书 《奏稿》卷一，页一。

八百人坐一船，周良才五百人坐一船，开字營程学启千三百人坐一船，看毕吩咐一番……辰刻已刻开行……申刻少荃来辞行。”

“三月十三日（公历4月11日）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树字、铭字两營之行……”

“三月十七日（公历4月15日）又至河下看洋船送春字營、鼎字營赴沪……”

“三月二十四日（公历4月22日）至城外洋船看庆字營淮勇赴上海，又有鼎字一哨、林字二哨……”

“三月三十日（公历4月28日）至洋船送林字營之行……”

“四月二十二日（公历5月20日）出城至河干送垣字營坐洋船至上海……”

“五月初二（公历5月29日）出城至洋船送熊字營赴上海。”

共计淮军陆师（包括湘军）十三營，正勇6 500人，这大概是不会错的。

如果加上黄翼升的淮杨水师4 000余人，大体上是1万人。

蔡时同志考证所依据的李鸿章的《复曾事恒十二丈》，发于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（公历3月25日），即淮军赴上海前十日，当时熊字、垣字两營尚未集结到安庆，所以信中谈到淮军（包括湘军）5 500人，这个数字是暂时的，并非至沪的准数！

董蔡时同志也可能说，我写的是淮军最初到达上海之数，不包括熊字、垣字两營。这不行，如果说是最初的，则应是随李首批到沪那2 000多人，但不是5 500人。同时蔡时同志考证后取了6 500之说，取了1万人之说，取了8 000人之说，上述三种说法并不是专指四月初四（公历5月2日）为

止！李鸿章到上海后第五天给曾国藩的第一封信写道：“淮勇二帮日内当到，会防局绅业与洋人议明留后帮船以载熊垣二营，该营到皖求即札知，以便饬局放船来接，”这清楚地反映了熊垣二营属于第三帮，同时不也清楚说明熊垣二营与前此5 500人属于一体么！据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载：

“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日（公历3月28日），江苏有绅士钱鼎铭、潘馥来请援带火轮船，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，随后更有轮船六号续至，每次七船计可载3 000人，将分作三次，迎接少荃之兵……”

可见分三次运输淮军至上海是计划内的事情，能说熊垣二营不应算入淮军至沪的数字之内么！

三

蔡时同志文中写道：

“淮军到安庆后，曾国藩命李鸿章将所有淮军按照湘军营制编组成军。1862年3月3日，曾国藩、李鸿章校阅淮勇，是为淮军成立的开始。”蔡时同志注明依据窦宗一《李鸿章年（日）谱》第4801页。窦书写道，3月3日（农历二月四日）

“鸿章随曾国藩检阅所部淮军，淮军正式成立。”没有注明根据，随后披露了一段材料“曾国藩奏：‘鸿章所募淮勇，训练两月，即可成军，拟派同曾国荃军由陆路沿长江冲过镇江’”。注明出自《曾文正公年谱》卷八页五及实录十九。”我们查阅《曾文正公年谱》，发现有一段记载：二月“初四阅视李公鸿章营勇及所部程学启、滕嗣林等营。”但查《实录》

（同治朝）十九卷，无所获。结合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记载：二月初四日“至城外李少荃营，又至韩正国营，程学启

营，李济元营，藤嗣林营。”大帅至营可以看做建军之始，因此我们同意蔡时同志的意见。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提出呢？有。据荣孟源《中国近代史历表》同治元年二月初四并非公历3月3日，乃3月4日也！这个问题对台湾学者窦宗一来说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们的研究条件有限，可对董蔡时同志来说却是不应该的！

四

我们读了董蔡时同志的文章之后，对淮军建立问题进行了探讨，现将初探体会写在下边。

淮军是为保持清朝政权而建立的。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，清朝制兵八旗、绿营无力镇压革命，清廷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，号召各省地主官绅举办团练。1852年曾国藩奉令帮办湖南团练，他一面办团练，一面组织湘军。1854年以后，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。1860年春，太平天国革命再度高涨，太平军破江南大营，随后深入江浙地区。8月清廷以曾国藩补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钦差大臣，令他迅速派兵“规复苏常”。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，清廷又赏曾国藩以太子少保衔。随后北京政变发生，那拉氏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军阀官僚，11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说：著“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，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，浙江军务著杭州将军瑞昌帮办……”并再次指示他“规复苏常”^①。曾国藩感到权大容易招忌，一再请求清廷收回成命，清廷不仅不答应他的请

^① 朱学勤等：《钦定剿平粤匪方略》（清同治十一年刻）卷二七六，页二十四。